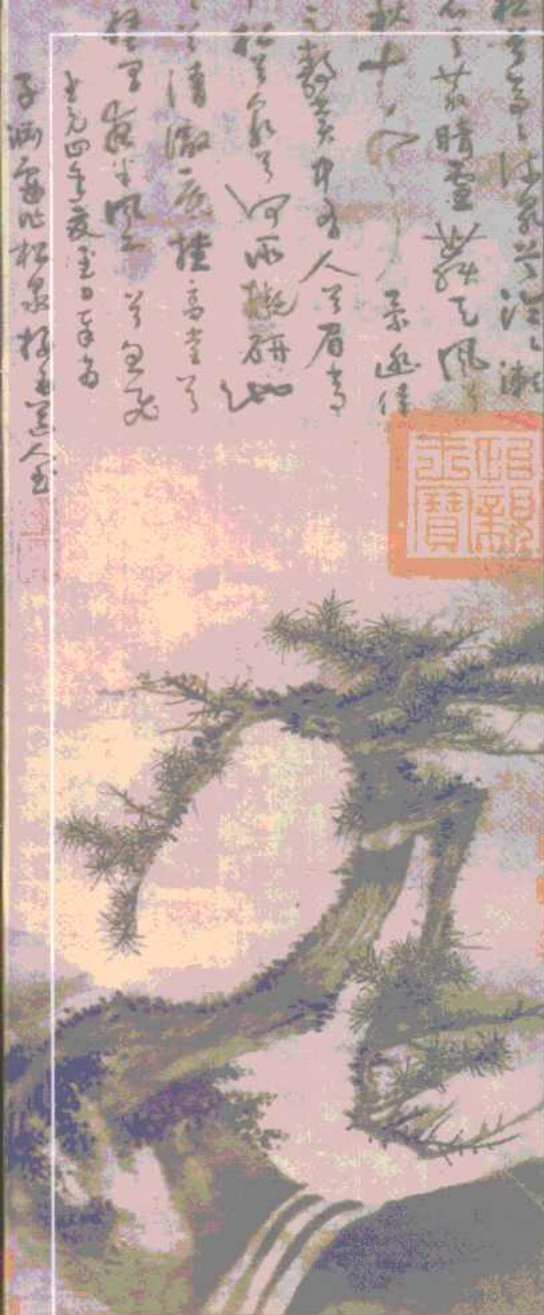


云间思辨

柳文耀 古典文学论集



柳文耀 著

学林出版社

云间思辨

柳文耀 古典文学论集

柳文耀 著

学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云间思辨:柳文耀古典文学论集/柳文耀著. —上海:
学林出版社, 2000. 10

ISBN 7-80616-958-X

I. 云... II. 柳... III. 古典文学—文学研究—中国—
文集 IV. I206.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45217 号

云间思辨

柳文耀古典文学论集



作 者——柳文耀

特约编辑——盛晓玲

责任编辑——乐惟清

封面设计——东 达

出 版——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楼 3 楼

电话:64515005 传真:64515005

发 行——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学林图书发行部(文庙路 120 号)

电话:63779027 传真:63768540

印 刷——松江区华亭印刷厂

开 本——850×1168 1/32

印 张——12.5

字 数——300 千字

版 次——2000 年 10 月第 1 版

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——3000

书 号——ISBN7-80616-958-X/I·340

定 价——26.00 元

夏完淳研究

夏完淳西行事迹钩沉

少年民族英雄夏完淳在弘光覆没后的第二年（1646年）“确曾到过湘鄂一带”。^①这是郭沫若先生当年的发现。他还推测，完淳此行，意在投奔那里的农民义军。可是终究由于缺乏依据，后来他否认了自己的发现。^②尽管如此，影响所及，直到五十年代，还有人提出应“姑存这一说，以待历史学家研究”。^③

然而，对夏完淳研究造诣极深的白坚先生却发现，在郭沫若推测夏完淳可能西行的那段日子里，完淳一直隐居在嘉定，“即或曾住他处，也不出邻近范围。”^④根本不可能有西行湘鄂之举。白坚此说，有侯歧曾《丙戌丁亥日记》为依据。据此书记载，完淳自1646年（丙戌年）“六月十七日抵达嘉定槎溪，在侯家的槎楼安顿下来。七至十一月，这部日记每月都有有关完淳活动的记载。”^⑤

不过，从郭沫若的发现，到白坚的否定，他们都将夏完淳的西行，集中在同一个年头，即1646年。可是，从南京倾覆到诗人殉国，前后共经历了三个年头。那么，在丙戌之外的其它两个年头，他是否还另有其它漫漫西行？从流传下来的一些资料中我们发现，从乙酉（1645年）八、九月父亲殉节之后，到这一年的年底间的三、四个月中，诗人的行踪

出现了一片空白。而恰恰是在这段日子里，我们从诗人本人的诗文中，依稀发现了他西行湘鄂的行踪。

《春兴八首·同钱大作》作于丙戌年的春天。这是一组摹仿杜甫史诗的沉郁苍凉的感兴之作，组诗分别回顾了从弘光覆没以来的历史事件和自己的经历、体验。这组诗的第一首是这样写的：

上苑东风试早莺，故宫依旧百花明。

江帆入镜移瓜步，胡马如云走石城。

金鼓平陵怜翟义，旌旗沧海葬田横。

伤心中夜看斗牛。醉把吴钩万里行。

在这首诗中，诗人以高度凝炼的笔调，展示出一幅自南京陷落到江南各地起义失败的历史性画卷。就在这史诗般的纪实笔触中，诗人留下了“醉把吴钩万里行”的行踪记录。对这次迢迢西行，完淳一直记忆犹新。直到他后来被捕入狱，还曾“忆当年，吴钩月下，万里风尘。”（《套数·自序》）这里所谓的“当年”显然就是“胡马如云”的乙酉年。至于“吴钩月下，万里风尘”，与“醉把吴钩万里行”指的是同一件事。值得指出的是，在诗人生活的最后三年中，他的活动范围大抵都是在以松江为中心的江浙一带，最远至多到过绍兴（事在丙戌之春），所以即使有外出奔走，也难以“万里”形容。相反，从诗中频频出现的湘鄂游踪分析，这里所说的“万里”之行，显然非此行莫属。

完淳“万里”之行，在他的《大哀赋》中其实也曾有透露。在这篇赋的序文中，诗人说：“先君绝命……漂泊无家。万里风尘，志存复楚。”在赋的正文中，他又说：“先子云亡……留遗孤于庐垓，曾仗剑于戎行。”这些地方都似

在披露出他曾万里远行的经历。完淳的父亲夏允彝之死，一说是八月赋绝命词，投渊而死，^⑥一说是“以九月十七日自沉于淞塘死”，^⑦由此而论，从时间上看，完淳“仗剑”“漂泊”作“万里”之行，当在那年八、九月后。

当然，作为一个年方十六岁的少年，在国破家亡的战乱之中，要作此漫漫西行，并非没有顾虑。在《怀母诗二首》中，他流露的正是这样的一份忧伤：“孤雏巢枯桐，朝夕忧斧柯。西顾千万里，欲往道路多。”、“遗雏在樊笼，宛转多商声。六翮犹未修，何以万里征？”一方面有感父亲殉难后自己处境的危难，一方面又忧虑西去道路的艰难与险阻。诗歌的字里行间，流露出的是诗人的真情与实感。出于“志存复楚”的坚定信念，同时也是有感于烈士亡灵的鼓励，夏完淳最后还是毅然踏上了西行的征途。至于这“万里西行”到底何去何从？这在《春兴》、《秋怀》以及《大哀赋》中都不曾具体涉及。在这方面，《道中作》一诗，倒为我们提供了一丝线索：

山行三日万山连，今日才开一面天。

石径渐平看马去，云林山霁见泉悬。

无人主碓春偏急，有妇当垆客易前。

下筴不须钱满百，荔香新酒缩头鳊。

此诗在夏完淳诗集里被编在《九日大风雨同智含夜饮》与《除夕追和广成先生韵》两首诗之间。这两首诗，前者作于乙酉重阳，后者作于乙酉除夕。从时间上分析，替完淳编这部诗集的王昶、庄师洛等人对这首诗产生时间的推断，倒与我们的观点相吻（在秋冬之间）。另外，从诗歌展现的风光、风物看，“万山连”的景色，当然不可能是指江南水

乡，也不像是绍兴一带的景象。至于“荔枝酒”、“缩头鳊”也不是当年江浙一带的物产。荔枝盛产于两广、福建，唐代时四川也出产。湖南与四川相邻，气候相近。再加明代气温较高，湖南产荔枝也不是没有可能。至于那“缩头鳊”，就是当年所称的“武昌鱼”。它盛产于江湘一带的江湖之中。据《襄阳耆旧传》说：“汉中鳊鱼甚美，常禁人捕。以槎断水，因谓之槎头缩头鳊。”宋代王禹偁的《襄阳诗》便也有“扶头好酒无辞醉，缩项鱼多且放馋”之句。这“缩项鳊”就是“缩头鳊”。因此，从这首诗所涉及的风光特产而言，夏完淳此行正是在西行江湘的道中。

从时间上看，完淳自八、九月后踏上了征途，到达江湘当已近严冬，他曾在那里徘徊寻觅。在《寒泛赋》中，他留下这样一段话语：“江汉河深，亦浮杯可渡……柴门半掩之野人，椎笠相逢之渔夫。烟水则羊裘已寻，风浪则鸥夷未遇”。在“飘零残腊，踟躅穷年”的岁暮迟冷中，他还体验过“漱妇以壶浆托命，漂母以一饭留恩”的滋味。在一篇《夜亭度雁赋》中，诗人更在“岁云暮矣”的长叹中，记下了他在“洞庭之水千里，九嶷之云一色”的异域所产生的“哀极目兮千里，愁远涉兮三湘”的悲伤。旅途的艰难，所寻找的又不遇，失望之下，诗人难免流露出对故乡的思恋：“朔风起兮天末，游子行兮未归。望旧都兮无极，思故乡兮永违”（《寒城闻角赋》）。这些作品中，江汉、洞庭、九嶷、三湘，应当都是实指。

夏完淳的西行大约一直延续到这一年的十二月下旬。在一首题为《十二月十八立春》的诗中，诗人留下“可怜又是艳阳时，孤客征衫泣路歧”这样的诗句。杨朱歧路，痛哭而

归。从这则典故中，诗人透露出他行将踏上归程的消息。与去时相比，完淳的归途比较顺利，到那年年底，他便已经回到故乡（这大概与沿长江顺流而下有关）。在作于丙戌新春的《人日与篆鸿同赋诗》中，他留下了“归人落雁花前恨”这样的诗句。“归人”云云，说的正是他已经回到了故乡。

如果说，我们上述的发现，还缺乏对整个西行经过的具体描写的话，那么诗人还有一首《芦花篇》，则可以填补这方面的空缺：

去时芦叶碧如染，归时芦花满江转。
乱逐轻风薄暮飞，细飘曲水凌波浅。
颇类潇湘放逐臣，翻似江湖羁旅人。
王孙东去愁芳草，公子西归采白萍。
当年罗绮秋光冷，一声芳管江天静。
到此风尘客子心，空留霜月芦花影。
雁声嘹唳寒江白，渔舟古渡吹横笛。
乌啼月落泪满衣，秋水连天独归客。

这里说的“公子西归”、“独归客”显然是他“万里西行”归来后的写照。从芦叶如染到芦花飘扬，正记叙了他从八、九月后踏上征途，又在隆冬回归的经过。

从夏完淳的诗赋中，我们已经勾勒出年轻诗人万里西行的大致经历。“国破家亡，军败全身。招魂而湘江有泪，从军而蜀国无弦。”（《大哀赋》）诗人此举，目的又是为什么？是去投奔那里的李自成义军？这一点连郭沫若自己也感到站不住脚。其实，照我们分析，夏完淳此行，恐怕是想去投奔正在湖南协助何腾蛟主持着那里的抗清大业的章旷。章旷是夏完淳的同乡长辈，又是他父亲的同社、同年挚友。甲

申年初，为了从农民军手里收复失地，他曾专程回松江，变卖家产，募兵西行。他的这一壮举定会给意气风发的少年夏完淳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后来，在北京、南京相继失陷之后，章旷又协助何腾蛟，“身扼湘阴、平江之冲，湖南恃以无恐”。^⑧从完淳角度分析，松江起义失败、父亲又殉难以后，他正处于进退失据的状态之中。苦无出路而远道西行前去投奔，那也是十分可能的事。另外，从他的一首《怀母诗》里所述的“青鸟翩然来”分析，他最后“西顾千万里”迢迢远征，说不定倒与章旷方面有使者来松江不无关系。

还存在问题的是，既然夏完淳风尘仆仆，不远万里来到湖南，可是为什么他没能在那里安顿下来，协助章旷共创大业？反而却来个掉转身子，亟亟东归了？究其原因，大致有两点：其一，当时之际，战事频频，抗清义军的驻地随形势而常常变动，也是常事。完淳一路寻踪，很可能始终没能接上头，盘缠用尽，当然只能回归。此外，完淳的旋即踏上归途，更可能与他的理想破灭有关。囿于封建正统观念的束缚，完淳对农民起义军有着深刻的偏见，且有不共戴天的架势（这在他的诗文中有所流露）。可是，当他到达湖南之日，正是何腾蛟与李自成余部携手联合之时。夏完淳对此毫无思想准备，一时之间难以容忍接受，拂袖而去，这也是极为自然的。加上当时湖南的形势，一切也不能令人乐观，农民义军与原明朝军队之间仍矛盾重重，其间又不乏骄纵贪婪之徒、目无法纪之辈。直至“杀民无虚日，腾蛟不能制”^⑨在如此形势之下，夏完淳一路耳闻目睹，又怎能不感到心寒？于是，带着一颗理想破灭而再遭创伤的心，他歧路回返，匆匆踏上归途。与赴湘一路水陆辗转、行道迟迟相比，

他的归程却十分顺利。到第二年新春伊始，他便已经回到故乡。这大概与归心似箭之下的船不系缆有关，更与顺水东下的畅通相符。

总之，完淳西行湘鄂确有其事。不过并不像当年郭沫若所推测，事在 1646 的丙戌之年，而是在前一年，即松江起义失败、父亲殉难的乙酉年，即 1645 年。至于他西行的目的，也并不是像郭沫若所曾推测的，是去投奔李自成余部，而是去投奔同乡、长辈章旷。至于他抵达湖南旋即失意而归，则与他理想的破灭、与他对现实形势难以接受有关。

① 郭沫若《夏完淳》。转引自《夏完淳集校笺》，第 601 页。

② 郭沫若《少年爱国诗人夏完淳》。同上书，第 610 页。

③ 《夏完淳集·前言》。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。

④⑤ 白坚《夏完淳集笺校》。上海古籍出版社本第 15、546 页。

⑥ 《明史稿》卷 258。

⑦ 《砥斋集》卷五《夏孝子传》。转引《笺校》第 546 页。

⑧⑨ 《明史·何腾蛟传》。中华书局本第 7187、7174 页。

原载《学术月刊》一九九五年第十一期。

三月晓迷吴苑路，万年春静禹陵碑

——夏完淳浙东之行发微，兼中书舍人“遥授”辨

要说夏完淳在明亡后曾负秘密使命到过绍兴，并因此受到“中书舍人”任命，恐怕难以令人接受。无论是《南疆逸史》还是《小腆纪年》，都曾留下诸如“上书鲁王，授中书舍人”，①“颇通问浙东，授中书舍人”②之类的记载。因为“上书”未必一定要亲自送去，授命更可以转达，所以，从屈大均《皇明四朝成仁录》，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《夏完淳集》，都有“鲁王遥授完淳为中书舍人”③之类的说法。

可是，从诗人的诗文中，我们却发现了他曾悄然到过绍兴的那段鲜为人知的秘密。《大哀赋》中，有这么一段话：

若乃天南鼎定，浙右龙骞……三吴渔猎，七郡风烟。扁舟势疾，三鼓气坚。余乃飘摇泽国，踟躅行间……短衣则东州亡命，长戟则西掖备员。

所谓的“天南鼎定，浙右龙骞”，分别指的是隆武帝在福建（天南）立朝，和鲁王在浙东绍兴（浙右）监国的两件事，前者事在乙酉六月，后者则发生在丙戌冬春之交。至于“三吴渔猎”，显然是记江南吴易义军的事。丙戌冬春之交，义军“既连攻嘉善、吴江，入其廓，声势渐振。是春，又与苏郡兵战于汾湖，斩获过当。”④所以才有“三鼓气

坚”之语。至于“余乃飘摇泽国”云云，则记叙了诗人乔装打扮（短衣），从江南水乡松江出发，来到东州的经过。从时间上看，当是在丙戌之春或稍后些日子。

这里首先需要解决的是，“东州”是否可以用来代指绍兴？从历史上看，它通常倒是用来指代山东一带的地名。在《后汉书·陈俊传》中，有一段关于琅邪太守陈俊平定叛乱有功，而受到皇帝嘉奖的记载，说是：“东州新平，大将军之功也”。^⑤显然，这里所谓的“东州”指的是山东琅邪一带。东州所指，到了宋代稍有变化，它往往泛指“京东诸州”，即京城开封以东地区，当然也包括山东。如名噪一时的“东州逸党”，指的就是那一地区的一批狂放不羁之士。从颜太初《东州逸党诗》中的记载看，“景祐初，青州牧有以荒淫放荡为事……翕然效之，浸以成风”^⑥谈“东州逸党”，却从“青州牧”说起，由此可见两地关系。再从活动的地域看，他们大抵也确是在山东的济、郛、齐、青一带。

那么，绍兴是否也有东州之称呢？回答倒也是肯定的。如东坡就曾称绍兴为“东州”。据《嘉泰会稽志》记载：“会稽府署据龙山之足北，上有蓬莱阁……东坡诗云：‘卧龙盘屈半东州’”^⑦卧龙山又称府山，它就在绍兴城中。从所谓“盘屈”而“半东州”这一点分析，这里的东州竟或许是指绍兴城，或者是城中的某个区域。另外，南宋周密也说过绍兴的东州。在《一萼红·登蓬莱阁有感》词中，诗人感事伤时，挥笔写下“回首天涯梦，几魂飞西浦，泪洒东州”这样悲怆之句。而在这一作品后面，诗人专门留下“（蓬莱）阁在绍兴，西浦、东州皆其地也。”^⑧这样的注脚。

就夏完淳而言，他的祖籍就是绍兴。崇祯十五年，他又随着从福建回松江奔丧的父亲，到过这里。以父亲的博学，加上平时的教诲，完淳对绍兴有这样一个“东州”之称，不会不知。再加上完淳与陈子龙关系非同寻常，父亲殉难之后，他一度跟随着这位师长。而陈子龙又恰恰曾经是绍兴府的司李，他的官署也就在龙山脚下。作为一个文人学者型的地方官，他对当地的一些典掌、故事当然也清楚。所以，即便是通过陈子龙，完淳也完全应当知道“东州”这一故实。至于后来用到自己的诗文中，并以诗家常用的以局部指代整体的修辞手法，用“东州”来代称绍兴，这也十分自然。

还存在问题的是，夏完淳亲临绍兴，而且当面受到鲁王的授命，历史上真有这样的事么？关于这个问题，还是先读读诗人的《土室余论》。这篇文章中有一段话值得注意：

“以淳拜命蜡丸，执戈幕府，成仁一死，抑亦何言！”翻译成今天的话，完淳无非是在说：“就凭我以蜡丸传书而接受任命，并在义军中担任监军一事，以死成仁，还多说些什么呢！”。这里“拜命蜡丸”至关重要，它实际上包含了一则典故。据《新唐书·颜正卿传》记载：“肃宗已即位灵武，正卿数遣使以蜡丸禀书陈事。”^⑨从历史上看，自从“安史之乱”爆发，玄宗仓惶撤退逃四川。这时太子李亨，审时度势，以监国身份留驻武灵，号令天下。这时，作为玄宗朝廷的一位地方官，颜正卿出于对形势的通盘考虑，毅然派出使者，与肃宗取得了联系，并接受肃宗的任命。这便是“拜命蜡丸”的出处。

令人拍案惊奇的是，吴易请陈子龙、夏完淳出使绍兴，从而在接受隆武政权任命的同时，也接受鲁王监国的封命

（完淳也因此获中书舍人的授命），这与作为玄宗朝庭命官的颜正卿，向监国的太子“数遣使”而“拜命蜡丸”，有着惊人的相似！原来，自弘光倾覆后，唐王聿键在群臣拥戴下，从镇江撤逃至福州，登上帝位，建立隆武小朝廷。作为江南义军首领，吴易也旋即受到隆武帝的任命。可是，就在紧接隆武立朝之后，鲁王以海也在绍兴以监国自命，建立了朝廷。作为隆武麾下的吴易，派出使者与“储贰”^⑩鲁王联系。完淳博古通今，写诗撰文长于用典，且常常出人意表。这里他利用现实与历史上的相似，巧妙地将自己的经历融入到熨贴之极，且令人拍案叫绝的典故之中。

关于吴易遣使而“拜命蜡丸”一事，《陈子龙年谱》中也曾有记录：“吴公以群将之意，请命于先生。先生为之驰蜡帛，间行入越，以捷闻监国。封公为长兴伯，群将皆受将军印。”^⑪当然，这段文字所记乃是陈子龙的事。不过，在父亲殉难后，完淳在相当一段时间曾与陈子龙患难与共，后来他遵照父亲遗愿，毁家纾难，来到了吴易军中。就在这期间，吴易请陈子龙赴绍兴蜡丸传书。这迢迢千里的出使远行，当然需要有人结伴，夏完淳无疑是最佳的人选。另外，从时间上看，完淳来到绍兴，事在“三月”的春天，而陈子龙赴绍兴，也恰恰是“事在丙戌三月”。^⑫这两者不会只是一种巧合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一旦我们知道了“东州”的实际含意，了解到完淳在明亡后负命来到过绍兴，那么，他的“中书舍人”的职衔的由来也就清楚了：因为有了“短衣则东州亡命”的经历，才因此有了“长戟则西掖备员”的结果。前因后果，十分清楚。这里以“西掖”借代“中书省”也有出

典，唐代的门下省、中书省，分设于宣政殿外日华门、月华门的東西两侧，^⑧这正犹如人的左右臂掖，^⑨所以文人墨客才以“右掖”或“西掖”代称“中书省”。显然，完淳中书舍人这一任命，并不是什么“遥授”而获，相反它是诗人为了替吴易义军联络，亲临绍兴后面受亲领。

关于完淳的绍兴之行，他在《春兴八首·同钱大作》中，也曾有所透露。在那组感世伤时的组诗之中，诗人以史诗般的笔触，回顾了自从“胡马如云走石城”的国破家亡之后的一段辛苦遭逢。这组诗的第三首是这么写的：

池塘杨柳绿荫垂，烟雨飞花满院悲。

三月晓迷吴苑路，万年春静禹陵碑。

江潮夜夜呼精卫，草树山山哭子规。

最是关情无限恨，胡笳偏向月中吹。

从这组诗顺序上看，此诗所记叙的乃是松江起义失败以后的事。就在这“精卫”、“子规”的“呼”、“哭”之间，诗人正是抒发了他那国破家亡后的悲怆。在这里“三月晓迷”记下的正是他一路摸索，来到绍兴的经过。这里的“吴苑路”虽说只是指江南水乡，但是出于诗歌对仗的要求（以“吴苑”对“禹陵”），将“短衣”“亡命”，一路由吴入越的路途，以“吴苑路”表达，也是可以理解。至于“万年春静禹陵碑”，指的就是他来到绍兴的事。禹陵地处绍兴，以局部指代全体，又是文人常用的修辞手法。至于一个“静”字，正细腻生动地再现了年轻的诗人，在历尽艰难险阻来到目的地后的欢欣。